

論《文選序》「別騷於賦」對傳統楚辭觀念的精心闡釋

[中國]李麗琴*

目 录

- 一、引言
- 二、蕭統《文選序》「別騷於賦」引發的問題
- 三、蕭統對兩漢經學本體下的楚辭觀念的微妙改動
- 四、蕭統對傳統楚辭觀念的精心闡釋
- 五、結論

一、引言

《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善的詩文總集的選本，不僅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而且對後世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據《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史書記載，昭明太子蕭統之前，已經出現一些總集，諸如杜預的《善文》、摯虞的《文章流別集》等。可見將詩文作品編纂結集，並加以評論，于魏晉以來，已蔚為一種時尚。但上述這些總集，隨著歷史和社會的變遷，大都逐漸被淘汰湮沒，或者僅存殘文片語，散見於其他著作之中。《昭明文選》卻唯獨得以保存，流傳千載，以至當今，堪當「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的美譽。¹⁾

《文選》成書不久，即出現了對《文選》的研究。此後，對《文選》的研究代不乏人。隋唐時期，是《文選》研究的繁盛期，出現了大量《文選》研究的成

* 雲南曲靖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蘇州研究院）講師。

1) 章學誠（1738-1801），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82。

果，研究《文選》形成一種專門的學問——《文選》學。隋唐時期的《文選》學研究奠定了《文選》學的顯學地位，成了後世《文選》學研究不可逾越的高峰。清代，《文選》研究出現了第二次高潮。²⁾「五四」以後，《文選》學衰落。新時期以來，以1988年「第一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為契機，《文選》研究再次活躍起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目前已成功舉辦了八屆，極大地推動了《文選》學的發展。近20年多來，《文選》研究有了新的發展，正在形成第三次高潮。³⁾

在西方，早在1897年，英國漢學家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的《中國文學史》，已經提及《昭明文選》，⁴⁾1917年出版的亞瑟·韋利 (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 的著名譯作《漢詩一百七十首》，多半是選自《昭明文選》，⁵⁾1926年，原籍俄國、移居巴黎的學者馬古禮 (Georges Margouliès) 出版了《〈文選〉辭賦譯注》，⁶⁾其中包括蕭統的《文選序》、班固的《兩都賦》、陸機的《文賦》及江淹的《別賦》，這些法文譯文都附有詳細的注釋。與此同時，德國漢學家何可思 (Eduard Erkes) 發表了宋玉《風賦》和《神女賦》的英文譯文。⁷⁾而奧地利漢學家贊克 (查赫

- 2) 江慶柏，〈清代的文選學〉，《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 (1987) : 108-111。
- 3) 穆克宏：〈20世紀中國文選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福建師範大學學報》，3 (2002) : 64-70。
- 4) [英]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1897, 作為戈斯 (Edmund W. Gosse) 主編《世界文學簡史叢書》(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第10種出版。單行本：倫敦：威廉·海涅曼公司 (William Heinemann), 1900年。美國：阿爾普頓出版公司 (D. Appleton & Co.), 1923年；1928年再版。紐約：叢樹出版社 (Grove Press), 1958年, 448頁；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67年, 510頁。佛蒙特州查理斯·E·塔特爾出版公司, 1973年修訂版。
- 5) [英]亞瑟·韋利 (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Constable and Co. 1917.
- 6) [法]馬古禮 (Georges Margouliès), *Le "Fou" dans le Wen-siuan. Etude et texts*, Paris: Paul Geuthner, 1926.
- 7) [德]何可思 (Eduard Erkes), "The Feng-Fu [Song of the Wind] by Song Yu, "Asia Major 3 (1926) :526-33;"Shen-nu fu [The Song of the Goddess] by Sung

Erwin von Zach) 博士在1927-1939年間，孜孜不倦地致力於將《昭明文選》譯成德文。1958年，哈佛燕京學社收集了他的翻譯作品，重印作《中國文選：〈文選〉（德文）譯本》，由海陶璋撰寫「前言」出版。⁸⁾

綜觀目前《文選》研究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文選》的編纂者、《文選》的編纂及成書時間、《文選》的選本來源以及《文選》的文體分類等方面。⁹⁾在這當中不可忽略的一個方面，是作為中古文論史上的重要文獻之一的《文選序》，¹⁰⁾其在「選學」研究中的重要意義。如何認識《文選序》及由《文選序》反映出來的蕭統的文學觀，學界早有定論。但是，學界所關注者，多在聯繫時代思潮，確認《文選》選文的美文標準，並確認蕭統的文學演變觀。¹¹⁾而關於昭明在《文選序》中闡明的理論意義，卻鮮有提及者。我們以為，要全面認識《文選》，就沒有理由忽視對昭明的《文選序》作認真探討。因為《文選》與《文選序》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另一方面，又由於《文選序》集中說明瞭昭明對文學的認識與《文選》選文的特點，對其所進行的研究，也將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六朝文學自覺的一些特徵。本著這一認識，本文即圍繞《文選序》「別騷於賦」的問題及其對傳統楚辭觀念的精心闡釋，探討蕭統於詩、賦、辭體之外另立騷體，「別騷於賦」，使「騷」得以擺脫騷賦一體的約束而獨立出來，以及這一「行動」作為兩漢以後「一種文學獨立價值觀念之覺醒」的表現，¹²⁾其在中國文學理論史上所獨具的意義和價值。

Yuh, "Toung Pao" 25 (1927-1928) :387-402.

8) [德]贊克 (Erwin von Zach, 1872-1942), *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s: Übersetzungen aus dem Wen hsüan*, 霍福民 (Alfred Hoffmann, 1911-) 整理, 方馬丁 (Ilse Martin Fang) 編輯, 2冊, 哈佛燕京叢書18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tudies, No. 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58.

9) 劉群棟, 〈當前《文選》研究中的四大熱點問題〉, 《求索》4 (2010): 162-164; 穆克宏〈蕭統研究三題〉, 《文學遺產》3 (2002): 12-22; 林大志〈蕭統與《文選》研究三題〉, 《合肥師範學院學報》27. 2 (2009): 7-21.

10) 朱自清 (1898—1948), 〈文選序「事出於沉思, 義歸乎翰藻」說〉, 載俞紹初、許逸民《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 (北京: 中華書局, 1998), 75-84.

11) 鄧一鳴, 〈試論蕭統的《文選序》〉, 《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8. 2(2006): 92-93.

12) 按: 柯林伍德認為, 任何歷史事件都有兩個方面, 即內在面 (Thought) 與外在面

二、蕭統《文選序》「別騷於賦」引發的問題

儘管蕭統在賦方面的創作成就不高，但他對賦卻高度重視，在他之前和同時的學者文士那裏，賦與辭、騷、頌的分別大都講究不嚴，而蕭統將前人使騷、頌、七、對問、設論等與賦混用的文體與賦分體獨立，各嚴其域，分別列為單獨的體類，這是蕭統賦學觀中極為特殊的一面。與此同時，這一做法也招致後世不少非議。對此，我們不妨通過其與前代賦體觀念的比較考其沿革與演變。

1. 騷賦同體

關於《楚辭》，漢人有一種看法，即將它與賦等同起來。班固《漢書·藝文志》就以屈原作品稱為「賦」。¹³⁾他在《漢書·賈誼傳》中說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¹⁴⁾即是明以《離騷》稱賦的例子；司馬遷稱屈原《懷沙》為《懷沙賦》。¹⁵⁾據湯炳正考證，西漢前期，「屈賦又可稱『辭』」。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先說屈原「嫻於辭令」，最後又說宋玉等人「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可見史遷是把屈原的『嫻於辭令』跟善於作『賦』結合起來加以論述的。這應該就是『辭』『賦』既可互稱也可『辭賦』連稱的原因」。¹⁶⁾要之，楚辭在漢代多被稱為賦；同時也被稱為「辭」，屈原的作品並未從楚辭作品群中單以「騷」目獨立出來。

(Event)。歷史學家所探求的歷史並不僅是單純的「事」，即只有外在面而無內在面者，而是行動(Actions)，而行動則為事之外在與內在兩面之合一。詳參[英]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1946) 23。

13) 班固 (32-92)，《漢書》，《四庫全書》冊2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18。

14) 班固 (32-92)，《漢書》，《四庫全書》冊2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11。

15) 司馬遷（前145-前87年后），《史記》，《四庫全書》冊2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32。

16) 湯炳正¹⁹¹⁰⁻¹⁹⁹⁸，《楚辭類稿》，（成都：巴蜀書社，1988）62。

魏晉時代，屈原仍是和荀卿、宋玉及賈誼等人的作品連在一起合稱為辭賦或賦的。晉皇甫謐《三都賦序》說：

……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意可觀，存其所感。¹⁷⁾

摯虞《文章流別論》說：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意，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也，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¹⁸⁾

這是明把屈原作品稱為「賦」了。而只是到了蕭統，始獨立騷體一目以指稱屈原作品。《文選序》有云：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弭。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¹⁹⁾

於此，蕭統於詩、賦、辭體之外另立騷體，把屈原的作品尊為「騷人之文」，別騷於賦。

2. 別騷於賦與分體雜碎

蕭統「別騷於賦」的做法，引起歷代學者的強烈關注。²⁰⁾其首先被作為

17) 李善 (630-689)，《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 858。

18) 嚴可均(1762-1843)，《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1905。

19) 李善 2。

《文選》「分體雜碎」「不足為法」的證據之一，而招致後人的激烈批評。宋吳子良《林下偶談》卷二「《離騷》名義」條：「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並不歸賦門，而別命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²¹⁾浦銑《複小齋賦話》卷上：「賦始於蘭陵而屈宋為之增華，故班固《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予嘗謂集賦者當以騷列於首，自來選家從不歸併賦門，可謂數典忘祖。」²²⁾

其實別騷於賦者，不自《文選》始。劉向編《楚辭》，便不收宋玉的賦。王逸《楚辭章句》亦然。劉勰《文心雕龍》便已分為《辨騷》與《詮賦》。梁任《文章緣起》云：「賦楚大夫宋玉作。《離騷》楚屈原所作。」²³⁾孔道編的文章總集，也別騷與賦。王應麟《玉海》卷五十四《藝文類·總集文章》引《中興書目》云：「(南齊)孔道集漢以後諸儒文章，今存十九卷。賦、頌、騷、銘、吊、典、書、表、論，凡十屬。」別騷於賦，是文體觀念進步的一種表現。騷以抒情為主，更多帶有詩的特徵，賦以鋪陳體物為主，更多帶有文的特徵。駱鴻凱說：「不知賦出於騷，騷為賦之祖，究可自為一類。彥和析論文體，以《辨騷》與

20) 按：西方學者關於《文選序》及其文體分類進行研究的重要論文之一，是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海陶璋 (James Robert Hightower) 的《〈文選〉與文體理論》(The Wen hsuan and Genre Theory)。這篇論文首先介紹了中國文學中文體論的發展簡史。接著，作者具體討論了從《漢書·藝文志》到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集》的文體論發展情形，在對《文選序》的精確翻譯和詳細注解的同時，對蕭統在《文選序》提到的各種文體名稱提供了詳細的資料及來源。詳參《哈佛亞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 (1957) :512-33；收入畢曉普 (John Lym Bishop) 編輯《中國文學研究》(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UP, 1965, 142-63；鄭州大學古籍所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下冊)，史慕鳴譯，周發祥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 1117-1130。

21) 吳子良 (1197-約1257)，〈林下偶談〉，《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22) [宋]浦銑，《複小齋賦話》，《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樵李遺書》)

23)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正德戊辰(1508年)劉洪慎獨齋刊本。)

《詮賦》分篇，是亦別騷於賦矣。《隋經籍志》集部特立《楚辭》一類，後世仍之，尤見推崇騷體，不與其他文辭同列之意。審是，可無疑於昭明之失當矣。」²⁴⁾《文苑英華》、《文體明辨》、《歷代賦匯》、今人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龔克昌撰《全漢賦評注》等，皆別騷於賦。

3. 別騷於賦與重賦輕騷

文體討論之外，日本學者甲斐勝二認為，蕭統別騷於賦並列騷體於賦體之後，實際上體現了蕭統重賦輕騷的文學觀念，²⁵⁾是把騷體「看作賦體的附屬」，是沒有給它「重要的地位的」。²⁶⁾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實際涉及漢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不同評價問題，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思想傾向間的差異，這既與時代背景有關，也與文學發展過程中對文學特質、地位、作用的認識局限有關。²⁷⁾但從《文選》以《離騷》代稱《楚辭》作品，且將《離騷》稱為「經」，而且《文選序》中「騷」的排列列於「詩」前來看，蕭統不獨不輕騷，反而是尊騷派。

屈原及《楚辭》，在漢魏六朝時期，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對其安排的是否妥當，往往可能牽涉到評價問題。如前所述，漢人將騷與賦等同，到了南朝，時

24) 駱鴻凱(1892-1955), 《文選學》, (北京:中華書局, 1989) 26-27。

25) 按: 甲斐勝二認為, 蕭統別立騷體是為了突出騷體從屈原而來。“屈原和《五經》聖人時代既不一樣, 產生的地域又不一樣, 並且沒有屈原繼承孔子道統的直接史料”, “所以, 如果認定‘賦’是從屈原《離騷》開始的話, 就不能聯繫到《五經》上”; 蕭統把賦體的直接創立者聯繫到宋玉, 因而具有根據《五經》的傳統性而具備經典特有的權威性。詳參甲斐勝二《試論《文選序》所體現的《離騷》觀》一文, 載趙福海《昭明文選與中國傳統文化: 第四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516。

26) 趙福海 516。

27) 按: 西漢時對屈原和《離騷》的評價, 當以劉安、司馬遷為代表, 極備推崇之辭。但到了東漢, 班固則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認為劉安的評價過高, 而指責屈原露才揚己, 責數懷王, 以至忿懣不容, 沉江而死, 是貶潔狂狷景行之士。對班固的指責, 王逸又不同意, 他稱《離騷》是依經立義, 故稱《離騷》為經。

人則有意識地加以分辨，如任昉《文章緣起》、劉勰《文心雕龍》就以賦和《離騷》區分開來，而阮孝緒《七錄》也將《楚辭》單獨列為一類。因此蕭統以《離騷》與賦分別，反映了他對辭賦二體的辨析，這是正確的見解。他的別騷於賦，並不與評價本身發生直接關係，而是與《楚辭》的特殊性有關。

關於這一點，錢穆在《讀文選》一文中有過十分精當的論說。他認為體物之賦和緣情之詩是必須區分明確的。「體物」重於外照，「緣情」重於內映，重在外照，故其描述必求特殊而具體；內映者，主以一己之內心情感為中心，使作品與作者相交融。此體惟詩最適。而「詩體即承騷而來也」，詩人，即騷人；然辭賦家與騷人或詩人卻有所區分，「直探文心」、重於內映者，可謂詩人或騷人。而辭賦家顯然是重於外照者。因而，錢穆以為，蕭統《文選序》別騷於賦的做法，因其「可謂之乃一種文學獨立價值之觀念之覺醒」，而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說：

此述屈子《離騷》，下開詩境。以其同屬言志抒情，故連類而及，以示別於上述紀事詠物之賦也。宋玉與荀卿並舉，列之在前，顧獨以騷體歸之屈子，不以荀宋為伍，此一分辨，直探文心，有闡微導正之功也。²⁸⁾

於此，我們可以知道，錢穆對《文選序》的「別騷於賦」所給予的「闡微導正」的評價，實際是重在騷賦「緣情」與「體物」的分別的。

4. 《文心雕龍》與別騷於賦

別騷於賦成為《文選》受《文心雕龍》影響的證據之一，並於此引發一些論爭。²⁹⁾《文選》與《文心雕龍》的結合研究，歷來為學界所注目。由於二者在文體

28) 錢穆 (1895-1990)，〈讀《文選》〉，《中國學術思想史論集》(三)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97。

29) 按：《文選》歷來被說成是與《文心雕龍》相似並受其影響。駱鴻凱〈《文選》指瑕〉、殷孟倫〈如何理解《文選》編選的標準〉、莫礪鋒〈從《文心雕龍》與《文選》

分類、選文定篇等方面既不乏相近之處，又存在懸殊差異，故而或求同，或辨異，關於它們之間的關係眾說紛紜。駱鴻凱等學者均認為劉勰的文學思想對蕭統有很大影響，³⁰⁾而現在清水凱夫先生認為《文心雕龍》對《文選》沒有任何影響，³¹⁾傅剛認為二者間存在不小的差異，《文選》更接近任昉的《文章緣起》而不是《文心雕龍》。³²⁾要全面分析劉勰和蕭統的文學思想及關係，那將是系統而複雜的工作。

我們以為，《文心雕龍》於《詮賦》篇外別立《辨騷》篇，並於《辨騷》中論說屈原《離騷》與《詩經》的四同四異，目的不過是把楚辭當作其「通變」原則的典範之作加以列舉，並作為世代文章家的學習楷模而專列一篇的。因而，僅從文體方面考慮蕭統的別騷於賦，尤其在剛剛經歷了魏晉這樣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之後，這樣的思考當是不夠全面與深刻的。

但不容忽略的是，《文選序》首先是一篇序文，而且極有可能就出自蕭統本人之手。³³⁾而“序”是中國文學思想幾個比較大的資料來源之一，「我們從中可以發現若干對標準價值觀念所做的最為有趣的精心闡釋和修改。選集之序經常是文學史和文類理論的重要資料來源。」³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文選

之比較看蕭統的文學思想)、何沛雄〈《文選》選賦義例論略〉等均持此論。(以上諸文分別見於俞紹初、許逸民 30-41、205-223、244-257、695-707。)但是，日本學者清水凱夫對此卻不以為然。詳參清水凱夫〈《文心雕龍》對《文選》的影響〉一文，載俞紹初、許逸民 1029。馬積高和王運熙對此也持異議。馬積高以為，“《文選》始分辭（騷）、賦為二。有人認為這種分法始於劉勰之既有《辨騷》，又有《詮賦》，殊不然。《辨騷》在《文心》中與《原道》、《征聖》、《宗經》、《正緯》等為一組，為總論性質，《詮賦》在《明詩》後，屬分體論，且《詮賦》明言賦‘拓宇于楚辭’，可見他並未別騷或辭於賦。”詳參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北京：中華書局，2001）13。王運熙也認為“從劉勰寫作此書的宗旨看，從全書的結構安排和重點所在看，它原來是一部寫作指導或文章做法。”詳參王運熙，《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30。

30) 駱鴻凱10。

31) [日]清水凱夫，《六朝文學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32) 傅剛，〈《昭明文選》研究〉下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3) 按：傅剛認為，“日本白文古抄本《文選序》上有標注‘太子令劉孝綽作之云云’。實際上，蕭統已經說得很清楚，‘餘監撫餘閒，居多暇日，曆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這樣的話，只能由身為太子的蕭統說出來，如果連一篇序文也要由人代筆的話，那史書及世人的讚美也就不好理解了”。詳參傅剛 183。

序》正是蕭統對已有的詩賦觀念所做的精心闡釋，「體物之賦」和「緣情之詩」在蕭統的觀念裏是涇渭分明的；更重要的是，對於傳統的楚辭觀念，蕭統另立「騷人之文」對之進行了微妙改動和精心闡釋，而且，正是這種「改動」和「闡釋」體現出蕭統不同於前人的進步文學觀念：首先是對屈原作品的解釋擺脫了兩漢以來的依經立義的傳統，使屈原作品獨立於經義之外而具有強烈的文學性；其次，蕭統敏銳地看到了屈原高潔的品格和獨特的個性，以及其理想不得實現、情感受制與他的創作及作品之間的關係，對文學作品的產生從實質上做出了抒發個人情感的解釋。我們以為，錢穆所說的「闡微導正之功」，實也可從這兩點得到闡釋。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騷、賦相別，不過是六朝繁盛的文體辨類活動中產生的一種普遍共識，作為一本文章總集，《文選》不可能如《文心雕龍》一般，說明騷、賦的體類內涵以及彼此間可能的關係，因此引發後世的反駁意見。³⁵⁾另一種意見認為，《文選》的編纂者與撰序者本非一人，故而在文學理念、文體排列、分類、名稱解說及評選標準等方面有所出入，本不足為怪。³⁶⁾而我們在此則是透過經學本體的視域，對這一問題予以論述。

三、蕭統對兩漢經學本體下的楚辭觀念的微妙改動

「本體」是一個民族文化傳統在信仰與意志上安身立命的終極。³⁷⁾楊乃喬先生認為：

34)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Reading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王柏華、陶慶梅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8。

35) 郭章裕，《古代雜文的演變：從〈文心雕龍〉、〈昭明文選〉到〈文苑英華〉》，博士論文，臺灣政治大學，2010年，126

36) 林伯謙，〈由《文選序》辨析選學若干疑案〉，《東吳中文學報》13. 5(2007)：106。

37) 楊乃喬，《悖立與整合：東方儒道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本體論、語言論比較》，(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如果在東方詩學文化傳統中追尋一種作為‘中心主義’及極端的‘話語權力’制約詩學、文學與美學發展的最高存在，那就是儒家詩學及其主體安身立命的本體範疇——經。³⁸⁾

因而，儒家詩學在創作論上把儒家經典文本《六經》（或《五經》）尊崇為文學創作必須遵循且不可超越的最高文學範本，把這一影響滲透於每一位接受儒家詩學闡釋原則的主體的靈魂深處，並外現於他們對文學現象進行闡釋和批評的各個方面。這樣看來，一切的詩文曲詞都被籠罩在「經」的外衣之下，而漢人對於淵源于南方荆楚文化的《楚辭》作出合於「經義」的闡釋，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了。³⁹⁾

1. 依經立義

王逸首先把《離騷》讀解為「經」，給予《離騷》絕對崇高的地位。在《楚辭章句敘》裏，王逸指出《離騷》接續了瀕於斷絕的《詩經》的傳統，在戰國時代是難能可貴的。接下來，他說：

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⁴⁰⁾

顯然，作品的意義和經典的意義被連在了一起。王逸在極力推崇《離騷》的思

38) 楊乃喬 49。

39) 按：摯虞《文章流別論》提出有的文體“原出於五經”，劉勰《文心雕龍·宗經》提出文章“原出於五經”，蕭統則提出“文”的“隨時變改”，認為諸種文體不依託五經，是隨時代獨立產生的，蕭統的論證及選文實踐是梁代“文”的自覺與“文”的獨立的具體表現。關於這一點，可參胡大雷，〈蕭統與文章“原出於五經”〉，《欽州學院學報》22（2007）：27-30。

40) 王逸（約公元89-158），《楚辭章句》，《四庫全書》冊10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5。

想背後，是把「經」作為恒定的不可動搖的衡量標準的，認為《離騷》既「依詩人之義」又合於「諷諫」，並且把《離騷》詩句具體闡釋為「依託五經以立義」。此外，漢代的劉安和班固對屈原及其《離騷》的評價也是「依經立義」的。班固的《離騷序》引淮南王劉安的評語：「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⁴¹⁾

劉安比附的標準是《詩經》；班固據此加以批評的標準也是《詩經》：「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⁴²⁾這樣，屈原「自鑄偉辭」的絕世才華便被降為「妙才」，而詩人不甘於同流合污的自沉之舉更成了並非「明哲」的證據，對於屈原作品及為人的評價都被打上了儒家正統的經學中心主義的烙印。

2. 發憤抒情

對於《楚辭》，在所有儒家正統的經學中心主義的闡釋之外，唯一有點清新之氣的是司馬遷的楚辭觀。在對屈原「志潔」和「行廉」的高尚品格加以讚美之後，他說：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冥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⁴³⁾

司馬遷認為《離騷》是屈原「憂愁幽思」鬱積的結果，是因「怨」而生，這一點可以被認為是對詩歌抒發個人情感的首肯，可以說，司馬遷應該是察覺到了詩歌在表現公共道德和美刺觀念之外，還具有表達個人情感的功能。但是，司馬遷畢竟生活在一個經學本體籠罩下的時代，無論如何，他都不可能徹底擺脫這一本體的束縛。

41) 李善 611。

42) 李善 611。

43) 司馬遷，《史記》，《四庫全書》冊2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30。

所以，在論述「發憤著述」這一普遍規律時，他仍然要到《五經》裏去尋找證據，把《詩》、《易》、《春秋》、《離騷》等等都作為他自己發憤著述的依據；而且，本著儒家詩論的「美刺」觀念，對《離騷》作出了「諷諫」、「爭議」的解說，「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議，《離騷》有之」；對屈原以後的楚辭作者也作出了「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的評價，這就很容易使我們把他所說的「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的觀點聯繫到「怨刺上政」上去，因而，司馬遷對屈原的評價，仍然沒有脫出經學中心主義的窠臼，可以說，整個有漢一代，無論褒貶，漢人對屈原評價的依據不外乎正統而權威的儒家經學傳統，辭（騷）賦的混為一體及對屈原作品所作的「依經立義」和「合於諷諫」的解說，使屈原作品中所蘊含的真正個人化的心靈情緒始終沒有被凸顯出來，《離騷》所代表的中國文學史上的真正個人獨抒心靈的純文學創作時代的開始的意義，還沒有被發現。

到了魏晉時代，道家思想的的衝擊使經學玄學化後，經學本體的束縛稍稍鬆動，人們更多的開始思考人生短暫和命運多艱等關乎個人的問題，經學和社會道德對人們的束縛有所減弱。在經學的闡釋之外，文學表現個人抱負和抒發個人情感的作用日漸凸現，個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師心使氣，文學也可以稍稍擺脫政治和道德的束縛而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個人創作可以不再為了歌功頌德和怨刺上政，可以服從於內心的需要而表現個人的思想感情。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曹丕所言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⁴⁴⁾ 首先標誌著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到來，即錢穆先生所言「中國文學史上純文學獨立價值之覺醒的時代」。⁴⁵⁾ 到陸機發出「詩緣情而綺靡」的呼聲之後，魏晉時代，大量抒寫個人情感的作品便湧現了；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蕭統對屈原作品的評價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44) 嚴可均 967。

45) 錢穆 187。

3. 文學獨立價值觀念之覺醒⁴⁶⁾

文學自覺的萌芽在漢代已經出現。《毛詩序》認為詩歌的特徵為：「吟詠情性」。《西京雜記》引司馬相如說賦曰：「合篆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這些認識均表明了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為文學創作獨具的、不同於其他文字作品的鮮明特徵。這種文學自覺萌芽的形成，當然以詩賦之類純文學創作的繁榮為前提，但這種萌芽一經形成，則標誌著人們對文學的認識的巨大飛躍。

《文選序》伊始，蕭統在對文學的形成作了一簡單回顧之後，便提出了文「隨時變改」的觀點，在蕭統看來，新的文學觀較之舊文學觀，其最大差別即在於它要求文學在形式上須綺靡與華麗。⁴⁷⁾雖然這種綺靡與華麗本身也是舊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趨勢，但它一旦超越了某種度，它將導致人們文學觀念的變化，促使人們對文學的認識產生本質飛躍。

就屈原的作品而言，蕭統首先把屈原的作品闡釋為創作主體心靈渴望不受局限而又不得不局限於某種特定情形下的張力的顯現，「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朔；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⁴⁸⁾可見，屈原作品就是作者主觀情感自由抒發的產物，毫無疑問，這已充分顯現了詩歌藝術的審美本質；而且，與司馬遷的「發憤著述」所不同的是，蕭統對屈原作品的闡釋已不再帶有經學束縛的痕跡而純把它們看作是作者內心悲哀憤懣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屈原的作品中，蕭統讀出了不同一般的人生悲劇和由此產生的滿腔悲憤之情。因

46) 按：學界關於《文選序》與六朝文學觀念自覺的關係的討論，可參黃河，〈昭明《文選序》與六朝文學的自覺〉，《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 (1988)：84-89；馬正學，〈從《文選》看蕭統的文學觀〉，《西北師大學報》，33.2(1996)：33-35；馮宇，〈對《文選序》審美觀的理性思考與芮國器〉，《求是學刊》，1 (1993)：78-81。

47) 吳瑞霞〈蕭統文學思想新論〉，《湖北師範學院學報》15. 2 (1995)：69-72；李桂廷〈蕭統文學觀念辨析〉，《德州師專學報》15. 1(1999)：47。

48) 湯炳正 2。

而，筆者以為，蕭統別騷於賦的初衷正是要使屈原作品逃離兩漢以來經學本體的窠臼，發掘出真正屬於「騷人之文」的那份純真。在剛剛經歷了「經學中心主義」的籠罩之後，這一做法，無疑是具有「闡微導正之功」的；同時，這也正是錢穆先生所謂《文選序》「乃一種純文學獨立價值之觀念之覺醒」的一個方面的表現。⁴⁹⁾

四、蕭統對傳統楚辭觀念的精心闡釋⁵⁰⁾

1. 騷人之文

屈原詩歌創作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藝術表現的強烈個性化。由於屈原出身于楚國的同姓貴族，「博聞強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⁵¹⁾從客觀的家族背景和主觀的個人條件兩方面，都具備了從事社會政治活動、在仕途上大展身手的充足條件，他本身也對自己的血緣、品質和才能，感到非常的自信、自豪和自負。他不僅懷抱著遠大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道德節操，而且具有豐富細膩的感情，甚至不乏敏感和偏激。因此，當他由於奸臣的陷害，昏君的怒疏，而在政治上飽受磨難，倍經坎坷，他那長期鬱積而成的滿腔怨憤之情，便真正成為其源於生活深處的痛切體驗的流露，並且烙印著鮮明的個性化特徵。

這種深刻而獨特的人生體驗，經過詩人審美想像的藝術昇華，凝聚到作品的字裏行間，就形成了具鮮明個性化色彩的以哀怨憤懣為基調的情感內涵。

《文選序》明以「騷人之文」指稱屈原的作品，這實際上意味著，在蕭統

49) 錢穆 187。

50) 按：這裏所謂「闡釋」，是在西方闡釋學 (hermeneutics) 意義上使用的。中國傳統訓話學和注釋學理論意義上的《文選》詮釋研究，即對《文選》詮釋體系、詮釋體式、文獻詮釋、文學詮釋等幾個方面給予梳理和討論的研究，可參馮淑靜《文選詮釋研究》，博士論文，山東大學，2006。

51) 司馬遷 530。

的觀念裏，屈原作品中所獨具的、具鮮明個性化色彩的、以哀怨憤懣為基調的情感內涵，已足以使「騷」從以往的騷賦一體的觀念中獨立出來而自成一體。在屈原的筆下，「騷」成為書寫憤懣之情的最好載體。

2. 騷人之情

美國學者宇文所安在分析《文心雕龍·體性》時認為，「體性」一詞的核心部分是「體」，即「規範形式」。屈原作品既成為一種「體」，那就意味著「騷」已成為一種「規範形式」（儘管也適用於其他一切規範類型，但在本文中，「體」是就文類或文體而言的）。他認為：

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說，任何個體的特性都會表達在某一規範形式之中；例如，「人性」造就了人體。根據人心，對人的性格類型可以作進一步的劃分；這些不同將表現在「文」裏，「文」即心的外在層面，而「文」也就是文學。⁵²⁾

在宇文所安看來，《體性》篇中的「性」是內在的東西，是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本性；「體」是「性」的外在對應物，它是某種規範顯現，其確定範圍與「性」的確定範圍是一致的。中國文學思想的一個信條就是「一切內在的東西都要走向外在的顯現，內與外是完全相符的」。⁵³⁾

這樣，對蕭統別騷於詩賦辭的觀念而言，其過人之處也正在於，他已確認「騷」以外的其他文類，都不足以「顯現」屈原「含忠履潔」的本性，也不足以「顯現」這一本性與當時「君匪從流，臣進逆耳」的惡劣環境所致的衝突，以及在衝突之中凸顯的詩人的「耿介之意」和「壹鬱之懷」。因而，蕭統在「合於經義與諷諫」的詩賦辭之外別立騷體，正是為了使屈原的高潔忠誠的本性有一個外在的對應物，「騷體」就是屈原，屈原就是「騷體」，「體」與

52) [美]宇文所安 216。

53) [美]宇文所安 217。

「性」的確定範圍是一致的。實際上，這也暗合了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關於作家人格與作品風格內在統一的普遍觀點。

可是，「體」是怎麼在時間中展開的，為什麼某一類寫作表現出了或應當表現出某些特質，而屈原筆下的「騷」為什麼會具有迥異於其他文體的風格，原因何在呢？宇文所安在對《文心雕龍·定勢》篇的解說裏做出了回答。《定勢》篇的「定」是指文本的特性及其恰當表現並不是隨意的，而是被一定的「體」所規定的。「勢」是對某種特性的偏好，該特性來自某種性格類型（「體」）；那麼，對屈原作品所具的獨特的「勢」，其對大膽的誇張、美妙的想像及絢麗的辭采和奇異的神話的偏好，並非屈原隨意所為，而是被囿於「騷體」的規範之中的，「勢」與「體」是不可分的。可是，限制「騷體」之「勢」的規範又源於何處呢？《定勢》篇的開頭即談到人的情感自然會引向某種文體，「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⁵⁴⁾的確如此，一種「情」（情緒或情況）引向一種「體」，一種「體」伴隨一種「勢」。很明顯，「騷體」就是屈原「鬱鬱怨憤」之情的產物。中國文學批評把作家與他所擅長的文類連在一起，這是有道理的，屈原和他所開創的「騷體」是不可分的。

3. 情之外顯之為文

《定勢》篇云：「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⁵⁵⁾

正如「色」是繪畫的媒介，「情」而非「言」是文學作品的媒介。在這裏，語言被視為情感的外在物，而不是如漢人在經學本體之下所闡釋的那樣，把語言視為道德禮教的外在物，詩不是「禮儀」的外在顯現而是「情」的外在顯現。與「文辭盡情」的觀點一致的是，蕭統也把「騷人之文」視為屈原「耿介之意」和「壹鬱之懷」的表現。當我們讀「騷」時，我們不是在讀辭賦，而

54) 王逸 1109。

55) 王逸 1109。

是在讀「騷人之情」。顯然，在蕭統的觀念裏，「騷人之情」與「辭賦家之情」的區分是涇渭分明的。這就是蕭統別騷於賦的深刻意。56)

此外，就「情交而雅俗異勢」而言，一個作品中的任何一個具體特性都來自「情」的某一種獨特的「交合」，而這種特性賦予作品一種獨特的勢，「騷體」所具有的那種獨特的「勢」正是源於屈原在特定背景中的情感受制，即司馬遷所言「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在「騷」體中，「文本禁不住暴露了人心」，57)「君匪從流，臣進逆耳」的「情致」導致了「騷體」獨具的憂傷凄切與辭采華豔之「勢」，「騷體」就是宣洩個人心中的種種無法排遣的愁緒以及表達各種矛盾思想的最好文類。

章學誠有言：「若夫托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58)屈原正是利用自己獨創的這種不同於詩賦的文體以抒發心中聚集的「耿介之意」和「壹鬱之懷」，這是純屬個人的情懷，也正是這種情懷使「騷」得以立體，使「騷」不必合於「經義」，也使「騷」不必合於「諷諫」，而這一點，恰恰正是「騷人之文」的獨特魅力。

五、結論

在《真理與方法》第二版序言中，伽達默爾明言「我認為海德格爾對人類此在的時間性分析已經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屬於主體的行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59)這一論斷首先明確將「理解」的問題設定於存在論的

56) 按：選學界對於蕭統別騷於賦的行動多有關注，側重點各有不同。如：馮莉《文選賦研究》，特列“別騷於賦”一目，肯定騷、賦分體對於文學發展的意義，但對於其間的原因，並未展開論述。參馮莉，《文選賦研究》，博士論文，北京語言大學。

57) [美]宇文所安 242。

58) 程千帆(1913-2000)，《文論十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143。

59) [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 [translation edited by Garrett Barden and John Cumming].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18.

層次。理解不是主體（或主觀）對物件採取的某種態度，既不是一種認識方式，也不是一種行動樣態；不是有時候進行理解，其他時候又不那樣的東西。人只要活著就已經是以「進行理解」的方式活著了。我們總是以已經「理解」的方式生存。

從本質上看，蕭統「別騷於賦」的觀念其實已經顯明其對於自己的時代及時下文風的理解。把騷列為單獨的一類，凸顯賦重體物而騷貴抒情的文體特徵，加以歸樂府於詩，在對純文學的文體分類上，顯示出較為進步的觀念，既重視傳統又不陷入保守與狹隘。在這當中體現的文學觀念，既昌明了時代精神，引導著文學的流向，又對齊梁時期逐漸形成的形式主義文風做出了有力的矯正。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CHENG

成複旺, 《中國文學理論史》,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7.

程千帆, 《文論十箋》, 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3.

DENG

鄧一鳴, 〈試論蕭統的《文選序》〉, 《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8. 2(2006)
: 92-93.

FENG

馮莉, 《文選賦研究》, 博士論文, 北京語言大學, 2008.

馮淑靜, 《文選詮釋研究》, 博士論文, 山東大學, 2006.

馮宇, 〈對《文選序》審美觀的理性思考與芮國器〉, 《求是學刊》, 1 (1993)
: 78-81.

FU

傅剛, 〈《昭明文選》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GUO

郭章裕, 《古代雜文的演變: 從〈文心雕龍〉、〈昭明文選〉到〈文苑英華〉》, 博士
論文, 臺灣政治大學, 2010.

HE

何沛雄, 〈《文選》選賦義例論略〉, 載俞紹初、許逸民 695-707.

HU

胡大雷, 〈蕭統與文章“原出於五經”〉, 《欽州學院學報》22. 2 (2007) :
27-30.

HUANG

黃河, 〈昭明《文選序》與六朝文學的自覺〉, 《華僑大學學報》(哲社版), 2
(1988) : 84-89.

Jl

紀昀,《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JlA

甲斐勝二,〈試論《文選序》所體現的《離騷》觀〉,載趙福海 516.

JIANG

江慶柏,〈清代的文選學〉,《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 (1987) : 108-111.

LI

李桂廷,〈蕭統文學觀念辨析〉,《德州師專學報》15. 1(1999) : 47.

李善,《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

LIN

林伯謙,〈由《文選序》辨析選學若干疑案〉,《東吳中文學報》13. 5(2007) : 75-107.

林大志,〈蕭統與《文選》研究三題〉,《合肥師範學院學報》27. 2 (2009) : 7-21.

LIU

劉群棟,〈當前《文選》研究中的四大熱點問題〉,《求索》4 (2010) : 162-164.

LUO

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1989.

——,《文選》指瑕〉,載俞紹初、許逸民 30-41.

MA

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北京:中華書局,2001.

馬正學,〈從《文選》看蕭統的文學觀〉,《西北師大學報》, 33. 2(1996) : 33-35.

MO

莫礪鋒,〈從《文心雕龍》與《文選》之比較看蕭統的文學思想〉,載俞紹初、許逸民 244-257.

MU

穆克宏,〈20世紀中國文選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福建師範大學學報》, 3 (2002) : 64-70.

——〈蕭統研究三題〉,《文學遺產》3 (2002) : 12-22.

PU

浦銑 《複小齋賦話》，《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携李遺書》。

QIAN

錢穆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QING

清水凱夫，《六朝文學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TANG

湯炳正，《楚辭類稿》，成都：巴蜀書社，1988。

WANG

王運熙，《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WU

吳瑞霞〈蕭統文學思想新論〉，《湖北師範學院學報》15. 2 (1995)：69-72。

吳子良 〈林下偶談〉，《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YAN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YANG

楊乃喬，《悖立與整合：東方儒道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本體論、語言論比較》，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

YIN

殷孟倫〈如何理解《文選》編選的標準〉，載俞紹初、許逸民 205-223。

YU

俞紹初、許逸民《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ZHANG

章如愚，《群書考索》，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正德戊辰(1508年)劉洪慎獨齋刊本。

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ZHAO

趙福海，《昭明文選與中國傳統文化：第四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ZHU

朱自清, 〈文選序「事出於沉思, 義歸乎翰藻」說〉, 載俞紹初、許逸民 75-84.

二、西文書目

Alfred Hoffmann, *Fang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tudies*, No. 18, Harvard UP, 1958.

Arthur David Waley,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Constable and Co. 1917.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1946.

Edmund W. Gosse, *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8.

Eduard Erkes, *The Feng-Fu [Song of the Wind] by Song Yu*, *Asia Major*3 (1926) :526-33.

_____, *Shen-nu fu [The Song of the Goddess] by Sung Yuh*, *T'oung Pao*25 (1927-1928) :387-402.

Georges Margouliès, *Le "Fou" dans le Wen-siuan. Etude et texts*, Paris: Paul Geuthner, 1926.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James Robert Hightower, *The Wen hsuan and Genre The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0 (1957) :512-33.

John Lym Bishop,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UP, 1965, 142-63.

Stephen Owen, *Reading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Harvard UP, 1992.

<Abstract>

An Interpretation on Idea of the Traditional ChuCi by Wen Xuan Xu

Li LiQin

International College/Suzhou Research Institut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s of Qu Yuan's works are limited to the traditional ones as established principles in accord with Jing (Confucian classics) and Influence (criticize those above) since Han Dynasty. However, XiaoTong proposed Sao Style besides Shi, Fu and Ci and respectfully named Qu Yuan's works as "poet's creation", which not only clearly showed the character of his works---strongly expressing personal feelings and emotions but also made Sao become an independent style beyond the restriction of JingXue. It manifested the wake of an independent literature value.

Key Words : The Sao writings, The Ontology of *Jing*, Forms, Momentum

투 고 일 : 2011. 5. 10. / 심 사 일 : 2011. 5. 20. ~ 2011.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6. 15.
